

自述·回忆·专访

王大鹏 编著

丁聪 插图

百年国士

九五叟 頌廷龍 題



之二 风号大树中天立



百年国士

● 风号大树中天立

王大鹏 编著
丁聪 插图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国土·之二:风号大树中天立/王大鹏编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7205-2

I. ①百… II. ①王… III. ①历史人物—生平事迹
—中国 IV. ①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219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百年国土

之二:风号大树中天立

王大鹏 编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205-2

2010年12月第1版

开本700×1000 1/16

201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31 1/4

定价:38.50元

目录

鲁 迅 (1881—1936 年)

鲁迅先生的母亲谈鲁迅先生 俞芳 /15

最后一天 景宋 /21

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 许钦文 /26

悼鲁迅 林语堂 /31

回忆鲁迅 郁达夫 /34

怀念鲁迅先生 巴金 /52

马一浮 (1883—1967 年)

陋巷 丰子恺 /63

马一浮 张中行 /67

苏曼殊 (1884—1918 年)

亡兄苏曼殊的身世

——致罗孝明先生长函 苏惠珊 /79

亦诗亦画话曼殊 柳无忌 刘昭明译 /86

一代奇才苏曼殊香港侧记 刘小清 /104

熊十力 (1885—1968 年)

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 徐复观 /125

在熊十力先生追念会上的讲话 牟宗三 /132

熊十力杂忆 钱穆 /146

怀念熊十力先生 冯友兰 /149

熊十力 张中行 /151

熊十力二三事 王元化 /155

沈兼士 (1887—1947 年)

敬怀沈兼士先生 公孙嫫 /166

记恩师沈兼士先生 张秀亚 /174

怀念尊敬的恩师沈兼士先生 周祖谟 /177

李大钊 (1889—1927 年)

《守常全集》题记 鲁迅 /191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高一涵 /193

忆守常 张申府 /198

回忆李大钊先生 梁漱溟 /203

陈寅恪 (1890—1969 年)

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陈寅恪 /214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 /215

回忆我家逃难前后

——记先父陈寅恪教授抗战前后教书生涯 陈流球 /216

谈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 /225

忆陈寅恪先生 劳幹 /232

记陈寅恪先生 毛子水 /237

怀念陈寅恪先生 冯友兰 /239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羨林 /242

刘半农 (1891—1934 年)

回忆我们的父亲——刘半农先生 刘小蕙 刘育伦 刘育敦 /260

忆刘半农君 鲁迅 /270

半农纪念 周作人 /272

刘半农 张中行 /276

胡 适（1891—1962年）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胡适 /291

胡适大博士 郭沫若 /294

最后的酒会

——记一代学人胡适博士的死 风舟 /297

深夜怀友 叶公超 /304

寒风凄雨哭大师 苏雪林 /307

我当了四年的学徒 胡颂平 /311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318

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 王志维 /324

胡适杂忆 钱穆 /328

胡适与北京大学 邓广铭口述 苏敏整理 /334

回忆中的胡适先生 冰心 /345

赵元任（1892—1982年）

和一个男青年（节选） 杨步伟 /353

西天还有些儿彩霞

——给爸爸朋友的一封信 赵如兰 /361

回忆往事

——纪念赵元任院士 杨时逢 /364

赵元任夫妇二三事 王东明 /368

顾颉刚（1893—1980年）

《北京岁月》（节选） 顾颉刚 /376

杂忆顾颉刚先生 吴锡泽 /382

悼念颀刚 郭绍虞 /394

梁漱溟 (1893—1988年)

谨记先父梁漱溟 梁培恕 /409

真正的人物 唐君毅 /415

梁漱溟杂忆 钱穆 /418

“仲尼燕居”

——悼念梁漱溟先生(节选) 袁鸿寿 /420

风号大树中天立

——梁漱溟先生访问记 任华 驰方 /432

吴宓 (1894—1978年)

最后的会面(节选) 吴学昭 /452

吴宓先生 温源宁 /458

回忆雨僧先生 季羨林 /461

吴宓先生与钱钟书 杨绛 /464

叶圣陶 (1894—1988年)

过去随谈 叶圣陶 /474

关于父亲 叶至诚 /480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4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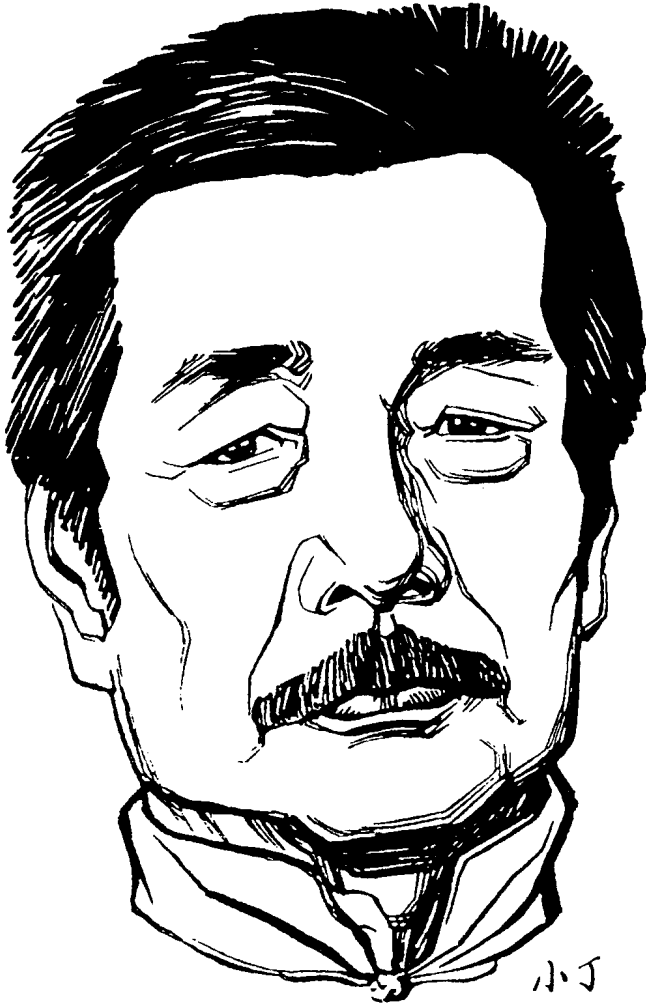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冰心 /490

海棠花下

——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 冰心 /492

怀念圣陶先生 吕叔湘 /493

难忘怀的一杯酒 刘心武 /499



鲁迅

(一八八二—一九三六年)

鲁 迅

鲁迅(1881—1936年),浙江绍兴人。原名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鲁迅”是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笔名。另有戛剑生、隋洛文、唐俟、迅行、申飞、何家干、孺牛、越山、且介等190余个笔名。祖父周介孚(1837—1904年),又名福清。清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曾任翰林编修、江西金溪县知县。1893年因科场行贿案下狱,在杭州关押8年,1901年1月获释,1904年病逝。父周伯宜(1860—1896年),秀才,有维新思想。后患水肿病,36岁即去世。母鲁瑞,出生农家,由于自修获得了能够看书的能力。二弟周作人(1885—1967年),原名魁寿,字星勺。后改名奎寿、启明、岂明、作人,字起孟,号知堂,晚号苦茶庵老人。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曾留学日本习法学、土木工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参加《新青年》、《新潮》杂志编辑工作。抗战时期,曾任伪职。著有《自己的书》、《雨天的书》、《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知堂回想录》等。三弟周建人(1888—1984年),原名松寿,字乔峰。笔名克士、松山、嵩山等。曾在北京大学旁听。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上海大学、暨南大学教授,浙江省省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曾任第9、10届中共中央委员。著有《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等。

鲁迅因家道中落,深感世态炎凉,“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幼时常和母亲到乡下外婆家,因而熟悉农村。7岁入家塾从周玉田诵《鉴略》,12岁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习《四书》、《五经》。1898年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带着母亲筹来的8元路费,到南京,考入免费的水师学堂,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之矿务铁路学堂。这时开始接触“新学”和鼓吹维新思想的书刊,其中最喜欢读严复所译的《天演论》(英·赫胥黎著),他从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中,确

立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发展观点。

1902年1月，随总办俞明震，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习日语。次年，剪辫后拍照留念，作《自题小像》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曾师事民主主义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与革命派人物陶成章等往来。1904年加入光复会。弘文学院毕业后，于1904年秋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受到教师藤野严九郎的关怀。在校观幻灯片，放映日俄战争时，一中国人被日本军人以俄国侦探罪名砍头示众的情景，围观中国看客却露出麻木神情。遂省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遂断然弃医从文。1906年到东京，与苏曼殊等筹办《新生》杂志（未成功），后撰写《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发表于《河南》杂志。在日本受到尼采的“费力尚强”学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章太炎“以国粹振兴民族精神”等思想的影响。日本7年，鲁迅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曾热情呼唤新的中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这种对人的“个性”的珍视，对“人国”的不倦追求，是鲁迅早期文化意识的精髓所在。

1906年6月在母亲催促下，由日本返回绍兴。7月26日与朱安（1877—1947年）结婚，朱安出身富家，住绍兴城内丁家弄，是年28岁。鲁迅对母亲包办的婚姻甚不满意，曾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的礼物，只能好好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后只4天即返回东京。1919年鲁母到北京，朱安侍奉在侧，掌管家务，直到鲁母1943年去世。鲁迅称朱安为“妇”、“内子”，仅为名义夫妻。朱安病逝于1947年6月29日，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将其安葬于京西板井村。

1909年6月，鲁迅由日归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及生理学教员。该校监督（校长）为沈钧儒，监学（教务长）为许寿裳。

次年秋，回绍兴，任绍兴府学堂监学，兼任博物学、生理学教员。1912年2月，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

1912年5月，随教育部至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院内之“藤花馆”，1916年5月移住同院“补树书屋”，至1919年11月鲁母到京，始迁居八道湾、砖塔胡同、官门口西三条（今辟为“鲁迅故居”，其右设“鲁迅博物馆”）等处。鲁迅在教育部，先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8月改任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教育等事项。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颓唐得很了”。于是业余以抄录碑帖、校辑古籍自遣，曾辑录《谢承后汉书》8卷，纂辑《唐宋传奇集》，校录《稽康集》等。

1918年初，在新时代的“风云”中，起而参加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编委会。在友人钱玄同“可以做点文章”的鼓励下，5月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旨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断言中国社会史就是“人吃人”的历史，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孔乙己》、《药》、《社戏》、《故乡》、《风波》、《阿Q正传》等作品，在鲁迅笔下，破产的乡村和败落的市镇，潦倒的文人、衣食无着的贫民，和被压在底层的劳苦农民，他们的挣扎和呼号，构成一幅幅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观。鲁迅自称其作品是“遵命文学”，“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而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中连载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晨报·副刊》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更使新文学升堂入室，在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廊中得与屈原、李杜、《红楼梦》并列，“说不完的”阿Q，同时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鲁迅是第一个触及“国民的弱点”这一重大社会课题的中国作家，他的阿Q，以文学形象“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画出其中的历史惰性——“精神胜利法”，而“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是迎接一场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文化偏至论》）的文化变革。《阿Q正传》是一部“人学”经典，奠定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地位，并使鲁迅获得世界性声誉。《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14个短篇小说，在1923年8月结集为《呐喊》出版。

五四前后，鲁迅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为着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为着“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且介亭杂文〉序言》），创造了人们称之为“匕首”或“投枪”的新文体——杂文。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时期（《小品文的危机》），最早是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继之有《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等，在这些杂文中，鲁迅重申《狂人日记》中的命题：在中国“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而启蒙者的鲁迅则“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后结集为《热风》（1925年11月出版）和《坟》（1927年3月出版）。

从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和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等校兼课，任讲师或教员，讲授“中国小说史”、“小说”、“新文艺”等课程，并和青年学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和亲密的情谊，从这一时期起，鲁迅就成为进步青年爱戴的朋友和导师。1923年12月4日出版《中国小说史略》。

五四落潮期，鲁迅组织了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1924年11月—1930年3月，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柔石、李小峰先后任主编，撰稿人还有川岛、刘半农、章衣萍、林语堂、钱玄同等），主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后又与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韦素园、韦丛芜等组织未名社（1925年8月—1933年春）和莽原社，编辑和出版《莽原》半月刊（1925年4月—1930年4月，鲁迅主编），主旨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未来”。

1924年至1925年，鲁迅继续写作短篇小说，有《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离婚》等11篇，1926年8月，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苦闷和寂寞中，编成第2本短篇小说集《彷徨》出版，以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祝福》，

1924年3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穷苦的农村寡妇祥林嫂，在鲁镇的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后来被婆家人捆起来卖到山里去，丈夫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病上，三岁多的孩子又让狼叼走了，只好再回到鲁四老爷家帮工。因为嫁过两次，被周围的人视为“不祥之物”，鲁家祭祖的时候，不让她沾手。柳妈诡秘地告诉她：“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解救的办法是到土地庙里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祥林嫂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12元鹰洋，果真捐了门槛。又到了冬至的祭祖时节，“她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她好像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在绝望中，她“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她被打发走了，沦为乞丐，切切地追问着“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带着这个谁也“说不清”的疑问，终于“穷死”在“祝福”的爆竹声中。祥林嫂在阴阳两界都没有做人的资格，肉体的摧残继之灵魂的掠夺，神权、君权、族权、夫权严酷而精致地铸就着古老的中国——闷死人的“一间铁屋子”。《祝福》的美学风格是它的“重压之感”（《〈自选集〉自序》），表现着鲁迅小说艺术的独特性和难以企及的感染力。

1924年至1926年间，作散文诗23篇，1927年7月结集为《野草》出版。自称“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野草〉英文译本序》1932年）。面对“旧战场”，鲁迅说：“我的心分外地寂寞。”但他仍相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他歌唱不死的战斗者：“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淡淡的血痕中——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他渴望战斗：“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的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名篇，鞭挞市侩主义，入骨

三分。《秋夜》、《风筝》、《好的故事》、《过客》等，在苍凉、沉郁中蕴涵着深邃的哲理。散文诗这一“五四”后的新文体，同杂文一样，首创于鲁迅，也在鲁迅手中达到其艺术高峰。

1925年，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为教育部免职。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作《纪念刘和珍君》，说：“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因此被列入段祺瑞执政府通缉名单，遂于8月26日偕许广平南下。这一时期所作，多为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战斗檄文，后结集为《华盖集》（1926年6月出版）和《华盖集续编》（1927年5月出版）。

1926年9月抵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史”。本年2月至11月，作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藤野先生》、《范爱农》等10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朝花夕拾·小引》），篇中“反顾”“旧来的意味”，有对故乡和童年的回想，有对“人间至爱者”的眷恋，笔下流溢着无限的爱、柔情和淡淡的感伤。这些文章结集为《朝花夕拾》（1928年9月出版），是怀旧散文的珍品，给予几代青少年的读书生活以特殊的美享受。

1927年1月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同年4月15日广州政变，曾多方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后愤而辞职。8月，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而已集》）。本年编定《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列入《鲁迅全集》第10卷出版）和杂文集《而已集》（1928年10月出版）。

1927年10月到上海，与许广平（1896—1968年，广东番禺人。字景宋。1923年就学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曾在《莽原》半月刊发表文章。1924年驱杨——荫榆——期间，任北京女子师大学生会总干事。1925年3月开始与鲁迅通信，其来往书信后来编为《两地书》，1933年出版。与鲁迅南下后，先到广州，任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鲁迅到中山大学后，任鲁迅助教。时常馈赠食物，鲁迅颇不安，许则戏曰：“这不要紧，我家的钱，原取之浙江——许祖父曾任清浙江巡抚——，现用之于浙江人，恰得其所。”鲁迅逝世后，与郑振铎等组织“复社”，致力刊行《鲁迅全集》。1941年曾遭日军拘捕。1945年冬，与马叙伦等发

起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3月，任全国妇联副主席，1954年，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欣慰的纪念》、《鲁迅回忆录》等）结婚。1929年9月独子海婴诞生。

1928年6月，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11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介绍东、北欧文艺，倡导新兴木刻艺术，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

1927—1929年作杂文34篇，多为与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的论争文章，集为《三闲集》（1932年9月出版）。其中1928年4月的《文艺与革命》一文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8月的《文学的阶级性》一文说到：若根据人的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正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就当时文艺论争中的文学观念、文学的功能，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个人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承认人的共同性，即人性的存在。

1927年10月，在上海劳动大学曾作《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说：“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性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集外集拾遗》，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出版）这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及其悲剧命运的重要论述。

1930年元旦，与冯雪峰创办的《萌芽》月刊（1930年1月—6月。后曾作为“左联”机关刊物，柔石、魏金枝参与编务）出版。2月13日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2日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忠告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那么“‘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并提出“左联”今后应注意的三点：“对于旧社会和旧

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3月、5月连续作《“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新月派梁实秋展开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坚持文学的阶级性，认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现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7月，(俄)蒲力汗诺夫《艺术论》中译本出版，包括《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等4篇文章。后又译(苏)卢那卡夫斯基《文艺与批评》等书。鲁迅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在1927年至1930年之间，鲁迅进化论的“思路”被“轰毁”，开始走向唯物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1931年2月7日，柔石、胡也频等24人遇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初闻噩耗的深夜，吟成七律一首，以寄哀思：“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两年后，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悼念亡友。同年，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作《“友邦惊诧”论》，指责国民党政府镇压请愿的爱国学生。1930年、1931年所作杂文37篇编为《二心集》(1932年10月出版)。

1932年4月24日，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4月30日，在《二心集·序言》中说：“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10月12日，应柳亚子之请，书写自作七律诗条幅，诗曰：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1933年，瞿秋白作《〈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杂文的特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了阐释：“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绪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8月，作《小品文的危机》，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的杂文，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起，至1935年12月《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死魂灵百图〉小引》，18年间约有80万字。鲁迅曾将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种，鲁迅杂文的“社会批评”固然为“民众斗争”“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而其“文明批评”则对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等极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独特的艺术形式，作出了前无古人的深刻的历史性论断，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勇敢的批判者，更是其真正的继承者，表现着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理性和睿智。

1933年，与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曾一同代表中国人民向德国驻沪领事递交对法西斯主义的抗议书。又主编《译文》，翻译（苏）法捷耶夫《毁灭》、（俄）果戈里《死魂灵》等长篇小说。1932年的杂文和1933年的部分杂文编为《南腔北调集》（1934年出版）。1934—1935年写成《非攻》、《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和前期的3篇，编成《故事新编》（1922—1935年作，8篇，1936年1月出版）。1933年所作杂文及1934年所作部分杂文分别收入《伪自由书》（1933年出版）、《准风月谈》（1934年出版）、《花边文学》（1936年出版）。

1934年3月，发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在中国的王道，看去